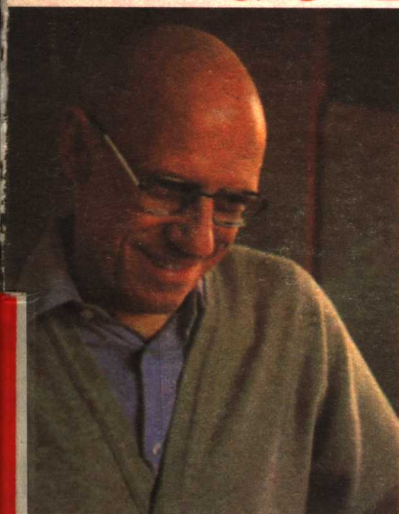


MI CHEL  
FOUCAULT

(法) 米歇尔·福柯著 余碧平译

性经验史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上海人民出版社

MI CHEL  
FOUCAULT

(法) 米歇尔·福柯著 余碧平译

性经验史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经验史/(法)福柯著;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ISBN 7-208-03370-6

I. 性… II. ①福…②余… III. 性学—研究

IV.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511 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装帧 陈楠

### 性经验史

[法] 米歇尔·福柯 著

余碧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5 插页 4 字数 438,000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7,001—12,100

ISBN 7-208-03370-6/C·82

定价 30.00 元

## 译者序

后结构主义不仅“谈玄论理”，而且还直接批评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文化”。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米歇尔·福柯。1926年10月15日，福柯出生在法国的普瓦利埃。1946—1949年，就读于巴黎高师和索邦大学，先后获得哲学和心理学文凭。1951年，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61年获国家博士学位。1970年被遴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84年6月25日因感染上艾滋病去世。福柯一生著作甚丰，闻名于世的有《癫狂与文明：古典时代的癫狂史》(1961年)、《诊所的诞生》(1963年)、《词与物》(1966年)、《知识考古学》(1969年)、《规训与惩罚》(1975年)和《性经验史》三卷(1976, 1984, 1984年)。

福柯对现代性和人本主义的批评，以及他对社会、知识、话语和权力的分析，构成了当代后现代主义阵营中一道独特“风景”。首先，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福柯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简言之，是它的构造物。福柯从各个方面对这种控制形式作了深度研究，包括病理学、医学、监狱和性学等等。福柯自称，他的计划旨在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进行批判，即质疑和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权力和控制的

结构。

与德勒兹、德里达等那一代“68年思想家”一样，福柯深受尼采的影响。尼采为这些战后法国思想先锋提供了可能“超越”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权力意志”和“谱系学方法”。在福柯等人看来，尼采的思想和方法使得人们不再把西方主流传统中的理性、知识、主体和进步等等视为理所当然的必然存在，而是认为理性与进步等观念与疯狂、权力和恶一样，都是各个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解。因而我们必须放弃追求历史中那永恒的抽象形式（如近代以来将理性和进步“加冕”，视为历史的必然和目的），承认历史只是“权力意志”的自由流变，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一定的社会规范和控制结构；而后在一定条件下，权力意志又会打破这些结构，重建新的规范和结构。这一过程就是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这里必须注意，尼采的“永恒轮回”不是低水平的简单重复和循环，而是指“权力意志”的永恒流变，“解构”与“重构”是它的“双刃”。人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这一流变过程中是否存在由低到高的历史进步或由上而下的倒退，而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理解“进步”、“倒退”等内涵及其形成、变迁的过程。同理，并不存在“理性”、“进步”、“主体性”、“知识”和“社会制度”的抽象意义，而只有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它们被构成的意义。对这些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被构成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尼采称为“谱系学”（la généalogie）。它不同于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不主张抽象的综合，而是倡导差异以及差异之间特定的时空关系。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的学说”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千百年来被中国人顶礼膜拜。但是如果国人回答“究竟什么是孔子的学说”这一问题，却未必存在一个标准答案。其实，“孔子的学说”一直处于一个不断被构成和被塑造的过程，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亦会如此。历史在不同时期赋

予它不同的意义。我们能够知道的,唯有一系列不同时期的“孔子的学说”,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转换的关系。因而,我们对任何对象的研究,只能深究它们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及其“谱系关系”。

二战前后,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曾在法国学界盛极一时,从科热夫、萨特、梅洛-庞蒂、伊波利特到拉康,都无不深受影响。但是对于60年代的“反叛一代”来说,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却成了保守和僵化的象征。而恰在此时,尼采的“谱系学方法”颇能迎合他们的口味。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等人争先恐后地向法国人推介尼采。1973年,他们还聚集在Royaumont,召开“今日的尼采”的讨论会。会后还编辑了两本论文集,从而宣告了尼采的法国时代的到来。以福柯为例,他专攻尼采的《道德谱系学》一书,深信尼采的谱系学方法,特别是尼采的论断——“求真的意志是与权力意志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说,他一生对人文学科、监狱、社会制度和伦理学的研究,始终不变的轴心就是尼采的谱系学方法和透视主义。透视主义是与传统哲学的系统方法相对立的。后者认为知识可以用系统的方法来把握现实。殊不知,任何知识都是对现实的一种透视,即从某一视点出发的观点,它本身并非是对现实的完全解释。相反,它只是唤起其他各种透视和观点去不断地解释现实,而且这个过程永没有终结。

此外,福柯还深受巴塔耶(G. Bataille)对启蒙理性和西方文化的现实原则的批判的影响。巴塔耶在《过剩的不同视觉》、《被诅咒的分配》和《宗教理论》中以异质性为研究对象,对颠覆资产阶级文化的工具理性和规范的宗教热情、性欲等陶醉经验所具有的爆炸性力量大加赞颂。在巴塔耶的影响下,福柯对现代理性及其规范的霸道大加鞭挞,而对那些把理性规范排斥到现代社会边缘地带的疯子、犯人、移民、同性恋者等等表现出极大的

同情。较之德勒兹、德里达等人,福柯所受的学院教育更为复杂和多样。他曾在巴黎高师和索邦大学获得哲学和心理学毕业证书,并且曾在心理诊所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现代社会的边缘地带为研究对象,揭示出现代社会规范、控制和塑造主体人的权力机制和结构。福柯的理论中最吸引世人的地方在于他用“考古学方法”和“谱系学方法”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社会的内部规范机制和边缘地带的抵抗倾向,即规范的话语实践与不规范的话语实践之间的对峙和相互渗透。

## 一、对现代性的批评

福柯把现代性分成两个时期:(1)古典时期(1660—1800年);(2)现代时期(1800—1950年)。在古典时期,一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类的方式开始形成,并且在现代时期达到高峰。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其实只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和技术日臻完善,“人并没有从一次次战争中逐渐进步,达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地。最终只是法制取代了战争状态;人在规范系统的范围内使用它的暴力,然后从控制到控制”。<sup>①</sup>

与霍克海默尔、阿多诺一样,福柯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力量。不过,前者讨论的是现代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社会心理的压抑,而福柯则集中关注个人在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会主体。在古典时期,人的理性则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它试图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中重建社会秩序。它用知识系统和话语实践来区分和规范各种经验形式。例如疯狂和性等,它们都被整合在现代知识的话语实践中,被社会制度所控制和管理。从18世纪以来,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被整合到现代话语

<sup>①</sup> 福柯:《语言、反记忆、实践》,康纳尔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51页。

实践的帝国之中。启蒙的任务就是伸展“理性的政治力量”，并且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度，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福柯揭开了现代性的假面具。原来，理性求真的精神将会带来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信条，其实名不副实，它不过是异于前现代社会的另一种传统制度罢了。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妄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福柯用高扬不可沟通性、差异性和离散性来对抗现代性的理性压抑。不过，福柯的处理方法与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不同。在其思想的早期，他把自己的立场定义为“知识考古学”(Archéologie du savoir)。这一考古学方法既不同于解释学方法，也与结构主义划清了界限。

(1) 首先，在福柯看来，解释学力图追寻话语背后潜藏的真理，或者恢复文本作者真正的主观意图。这种由表及里的现代解释方法以系统性、连贯性和因果性为准绳。福柯在《诊所的诞生》中明确反对这种追寻“观念史的混乱的、潜在的和邪恶的结构”的方法<sup>①</sup>，认为我们只能对人类的认识史做“考古学”的研究，探究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即支配我们思想和话语实践的推论理性(la rationalité discursive)被“组装”起来的各种规则是什么？这些“组装的规则无法自我说明，只有在广泛不同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对象中，我们才能发现它们。这就是我一直在考古学的层面上着力揭示的”。<sup>②</sup>

(2) 虽然从表面上看，考古学的方法与结构主义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是福柯所研究的那些“组装”我们话语理性的各种规则并不是普遍的和不变的，也不像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潜藏在意识深处的一般结构。它们都将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并

① 福柯：《诊所的诞生》，纽约，1975年，第195页。

② 福柯：《词与物》，纽约，1973年，第11页。



且只对特定时期的话语实践有效。用福柯的话来说,这些规则只是知识、知觉和真理的历史的先验条件。它们构成了文化的基本信码,即“知识型”(episteme),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里各种经验秩序和社会实践。

在《癫狂与文明》一书中,福柯的意图是想写成一本“沉默的考古学”,即癫狂是如何被历史地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进而被打入冷宫的。他首先发现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656年之间的某种历史中断。在1656年之前,西方社会和文化尚能接受癫狂现象,但是当1656年巴黎“综合医院”诞生时,癫狂现象完全被作为异己和“非理性的危险”而被排斥。由此,反对和压抑“癫狂”现象的话语结构和社会制度同时被建立起来。在古典的和现代的话语实践中,心智健全与精神病、正常与反常之间的界限首先被确立起来。在《诊所的诞生》中,福柯指出,现代医疗诊断不再是医生个人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受制于一套现代医疗话语结构和规则,它们是一切现代诊断可能性的条件。<sup>①</sup>

此后,在《词与物》中,福柯着手对现代人文科学进行考古学分析。他研究了现代人文科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定的话语结构和规则。他详细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内在规则、前提和规范程序。特别是,福柯分析出“人”是随着生命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兴盛而诞生的。简言之,“人”是现代时期推论出来的产物。具体说来,随着古典时期的表现模式的解体,人类自身也第一次不仅成为求知的主体,而且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对象,即作为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由此,“人”这个概念才出现了。不过从一开始,“人”这个概念就十分矛盾,它身兼两种职能,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被经验科学研究的对象,即它是“构成者与被构成者”的混合体。这在

<sup>①</sup> 福柯:《诊所的诞生》,第14页。

康德和胡塞尔的学说中充分表现出来。

但是,随着20世纪的到来,各种新科学相继问世,诸如“精神分析理论”、“语言学”和“人种学”等,使得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岌岌可危了,主体不再是认识和主宰对象的出发点,而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因而“人”也就随之死亡。

由以上分析可知,福柯追求的分析方法与现代性的整体描述相去甚远。他说:“整体描述法就是让一切现象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一种世界观。”而考古学方法则关注一个“推论的空间”,即研究在推论空间中各种要素如何历史地被整合到某一规范结构之中,而后这一结构又如何解体和被新的结构所取代?因而福柯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历史只是历史中各要素不断离散与重组的水平域展开,没有任何终极目标在引导历史。

## 二、尼采和谱系学方法

在1970年前后,福柯从考古学方法转向了谱系学方法,也即从对理论和知识的考古学研究转向对社会制度和话语实践的谱系学研究:把话语置入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中,揭示出其中的权力机制。在《语言的话语》一文中,福柯对话语的构成进行了谱系学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某种权力关系控制着话语结构。此后,在《尼采、谱系学和历史》(1971年)一文中,福柯对尼采的谱系学方法进行了分析,并且在随后发表的《规训与惩罚》(1975年)中具体应用了谱系学方法。

这里必须说明,谱系学方法并不是与考古学方法相对立的,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因为理论同时也是实践,当我们对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进行研究时,也即知识和主体被构成的各种规则时,这些可能性条件不仅包括理论层面上的,也包括物质层面上

的。换言之，“知识型”不仅是一种推论机制，而且是一种权力机制。因而，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是对早期考古学方法的深化和发展。由此，对现代性的研究，仅仅指出“主体”和“人”的概念是现代知识型的推论机制的构造物，这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指出其中的权力机制，即人是怎样在诸如监狱、学校、医院、车间和军队等制度中被权力机制规范和塑造成“主体”的，规范的手段包括作息时间表、监视行为的措施、各种奖励服从和惩罚抗拒的测验，以及提高工作伦理的规范化判断等。学生、囚犯和士兵们的生活都一样被规范和监督。个体不仅仅是推论的构成物，也是各种政治权力塑造出来的产物。“规训‘塑造’了个体；它是权力的特殊手段。个体则被权力视为既是对象，也是其运用的工具。”<sup>①</sup> 规训的终极目标和结果就是“规范化”（la normalisation），即消除一切不规范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通过改造精神和身体达到“脱胎换骨”，塑造出温驯的和有用的主体来。

同样，在《性经验史》（1976年）中，福柯试图勾勒出一部自16世纪末以来在用科学方法研究性的话语中规训身体的权力机制的历史。权力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压抑性的，而是用推论的方式塑造出“性”和有着性欲的主体来。因而没有超脱历史条件和权力控制的知识、性和快乐等概念。

显然，福柯受到尼采《道德谱系学》的强烈影响。和尼采对道德、禁欲、正义和惩罚的谱系学分析一样，福柯对那些被主流社会和科学所排斥和遗忘的边缘话语进行了历史研究。他认为这些边缘话语，诸如癫狂话语、医疗话语、惩罚话语和性话语，都有着独立的历史和制度。这些微观话语无法用宏观的国家和经济制度来解释。现代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提倡规范严谨的总体性话语，因而也无法解释这些微观话语。

---

① 福柯：《规训与惩罚》，纽约，1975年，第170页。

### 三、权力—知识—主体：福柯的后现代分析

从70年代起,福柯开始在非总体化、非表现性和反人本主义的框架下重新思考现代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他反对把权力的本质简单地规定成压抑,也拒斥权力为国家机器专属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现代宏观理论。他提出了一套后现代的微观权力论。具体说来,他反对两种现代宏观权力论:(1)马克思的经济主义模式;(2)现代法律模式。前者主张经济决定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因而权力不仅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手段,也是无产阶级反抗压迫、夺取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简言之,权力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后者则在法权、道德权力和政治主权的意义上解释权力,它是专属于法人主体的。对于福柯来说,“权力”是一个尚未规定的、推论的、非主体化的生产性过程,它把人不断地构成和塑造为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它本质上不是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力量,它只“关注生产性力量,让它们发展并且规范它们,而不愿阻碍它们、压抑它们或者毁灭它们”。<sup>①</sup>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描述了历史上从压抑性权力模式向生产性权力模式的转变,即从对达米扬(Damiens)的残酷折磨到对囚犯、学生等的道德改造。权力不再是一种物质力量如刑法(“杀一儆百”)的代名词,而是通过社会规范、政治措施来规劝和改造人。

在《性经验史》中,福柯称这一新的权力模式为“生命—权力”(biopouvoir)。它首先是一种规训的力量,是“人体的解剖政治学”(anatomo-politique du corps humain)所讨论的对象。那么

<sup>①</sup> 福柯:《性经验史》,伽里马赫出版社,1976年,第179页。

什么是“规训”(surveiller)呢?福柯把它定义为“规范人的多样性的手段”。<sup>①</sup>它源于修道院,并在17世纪晚期发生瘟疫的小镇上发展起来。最初这只是一个监督和隔离的方法,如在瘟疫流行时期,必须首先找出人群中感染上瘟疫的病人,然后把他们与正常人隔离开来。这种规训的手段不久就迅速地应用到整个社会中去,成为一种规范制度。

其次,这种新的生命—权力是专门对付“人类的身体”(le corps-espèce),即“社会众生”(la population)。福柯指出:“各种政府发现它们对付的对象并不是臣民或‘人民’,而是‘众生’,以及它特殊的现象和各种变量:出生率与死亡率、寿命期望值、生育率、健康状况、发病频率、饮食和居住模式等。”<sup>②</sup>这种对“社会众生”的监督和规训,其目的在于“让生命进入历史”,把一个生物人整合在知识和权力的结构之中,成为符合各种规范的主体。因而在18世纪,性成了理性管理和塑造的对象。

此外,福柯反对知识是中性的和客观的实证主义观点和知识是解放全人类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认为“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换言之,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因而,现代性的理性观念和解放观念受到质疑和批判。在法文中,“discipline”就兼有“学科”和“规训”的双重意义,换言之,任何学科同时也就是一种社会规范。比如,“精神病理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等学科是从社会监视、规训大众和惩罚犯人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专门研究领域,同时这些学科的研究结果又强化和改进了社会规训和控制的手段。而医院、精神病院、避难所和监狱只是这些所谓学术研究的实验室,目的仍然在于更好地强化社会控制。

---

① 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18页。

② 福柯:《性经验史》,第36页。

不过,与鲍德里亚尔等极左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福柯对启蒙理性并不完全持拒斥态度。在《什么是启蒙?》中,福柯认为,在我们的时代与启蒙时代之间仍有某种连续性,即理性对独断论和教条的批判作用。因而完全接受启蒙理性与完全拒斥启蒙理性同样不可取。他指出:“如果说理性是应该被消灭的敌人这种论断是极端危险的话,那么,说任何批判的质疑将会把我们导向非理性的论断也同样危险的。”<sup>①</sup>总之,福柯所持的理性观念是批判性的和创造性的,它与哈贝马斯、利奥塔的理性观念其实相去并不太远。

#### 四、控制和抵抗

对于福柯而言,权力已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把每个个体构成和塑造成主体,构成了知识和快乐,规范和驯服身体,使其服从并被整合到社会秩序之中。自17世纪以降,个体已落入一系列规训的“牢笼”之中,一种全方位的规范力量监视、判定、衡量和纠正个体的每一步行为。在社会上,没有“原初自由的空间”,权力无所不在。福柯指出:“我注意的是这一事实:任何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权力关系。我们是在一种拥有永恒战略关系的世界中行事的。”<sup>②</sup>

虽然福柯认为权力无所不在并且正不断地塑造和规范我们每个个体,但是这并不表明福柯是一位宿命论者。以福柯之见,人类并非无能为力,唯有屈从权力机制的摆弄。当然,政治抗争等人为介入是否能改变权力机制,这是有条件的。首先,权力本

<sup>①</sup> Foucault Reader, 纽约, 1984年, p. 249.

<sup>②</sup>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ed. by D. Kritzman, New Yorks, 1988, p. 168.

身是处于不断自组织过程之中,而个体的被塑造和积极抗争都是权力自组织过程本身的微观体现。福柯指出:“我要说:一旦存在权力关系,那么就会有抗争的可能。我们决不能被权力诱入圈套;我们总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按照某种精确的战略改变它的控制。”<sup>①</sup>在《规训与惩罚》中,他还简略地讨论了反制规训和规范化机制的“流行的非法性”和非规训的战略。<sup>②</sup>

在《性经验史》中,虽然有关“堕落”的话语增强了社会控制的机制,但是它们也产生了一种颠倒的话语,这就是,同性恋者们也要求社会承认他们是合法的团体。<sup>③</sup>

不过,这种祈求他人认可从而改变权力机制是非常少见的,也是异常困难的。因为个体们已被权力机制等级化和分门别类了,或被驯服,或被拒斥,界限非常明确。因而要让权力机制许可界限外的东西合法化,是非常困难的。从《性经验史》第二卷开始,尤其在第三卷中,福柯从强调“控制的技术”转向到“自我的技术”(la technologie de soi),强调个体的自我改变。而且,这种自我改变是战略性的,而不再屈从于规范严谨的宏观理论。

福柯反对现代宏观政治二元对立的解释方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把政治看成是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争夺国家与经济的中心权力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福柯则相反,他着眼于在社会的微观层面上的各种抗争。如在监狱、避难所、医院和学校之中,各种非规范的抵制和抗争正在瓦解宏观社会规范机制的中心指向。这就是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所要倡导的微观政治。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多元取向的和离散的,虽然在各个历史

---

①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ed. by D. Krizmas, New Yorks, 1988, p. 123.

② 《规训与惩罚》, p. 273ff.

③ 《性经验史》, 第 65—66 页。

时期,这些离散的权力会自我整合成某一规范机制,但是这些规范的权力机制从来都不是完全规范严谨的,许多非规范的权力就被它排斥到边缘地带。这些被排斥的权力仍在不停地抵制和抗争,最终将瓦解当时的权力规范。因而,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就在于鼓励和倡导这些微观的离散的权力,让它们增殖发展,反对任何旨在整合它们的“同一性政治”。

在此意义上,福柯批评了代表所有被压迫人民的“一般知识分子”概念。因为任何“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同一性政治”的代言人,因而也是另一种控制的代名词。为此,福柯倡导一种“特殊知识分子”,即他倡导每一个具体的微观抗争和话语,扮演顾问的角色,而不是领导者。因为“不存在大拒绝、革命的灵魂、一起反抗的源泉,或者纯粹的革命规律。相反,只有多元抗争,每一抗争都是特殊个案”。<sup>①</sup>他还指出:“我理解的在我们社会中的现实政治任务在于:批判看似中立的和独立的各种制度的运作;批判它们掩盖了一直在隐蔽地起作用的政治暴乱;然后我们可以和他们战斗。”<sup>②</sup>这就是福柯倡导的“政治谱系学”。其例证就是他撰写的《性经验史》。他反对当代“性解放”概念,认为这太过主观随意了。他力图揭示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性”的观念,以及在早期基督教中“性”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而后在现代又如何演变成规训和治疗的技术,即如何把个体整合到规范话语和同一性之中的技术。

具体说来,福柯的微观政治论包括两个方面:(1)话语政治(a discourse politics)和(2)生命政治(a bio-politics)。话语政治倡导被边缘化的个体和团体起来反抗主流话语的霸权,打碎旨

① 《性经验史》,第126页。

② 《人性:公正对权力》, in Fons Elder (ed.), *Reflexive power: the Basic concerns of Mankinds*, London, Souvenir Press.



在将个体整合到规范同一体中的话语框架,促成各式各样的微观话语自由发展和增生繁殖。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具有权力机制,话语规则决定了什么样的说话和实践方式是合理的和正当的,而与之唱反调的话语实践则不是被拒绝,就是被边缘化。因而话语政治就是要倡导这些被边缘化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s),以期最终瓦解主流话语“一手遮天”的奢望。其次,生命政治的着眼点与话语政治不同。它倡导个体摆脱主流规训权力的束缚,创造新的欲望和快乐模式来重塑身体。福柯相信,人类有可能创造新的欲望和快乐模式来取代现代的主体性模式。不过,必须指出,福柯并不认为这些新的模式就是当代流行的“性解放”模式。总之,话语政治和生命政治是互为表里的,前者更多地倡导对主流话语控制机制的反思和批判,而后者则提供了一种抗争和改变个体生存状态的可能途径,即身体有着自我重塑和超越潜能。这也许就是福柯向世人所展示的走出现代性的“获救的希望”。在《性经验史》第二、三卷中,他一改前期偏重反思和批判的研究路数,专门谈论走出“现代性”的可能性。这就是有关“伦理学”和“自我的技术”的讨论。

## 五、伦理学和自我的技术学

如果说在60年代福柯专攻知识考古学,在70年代他又转向权力谱系学,那么从80年代起,他则关注“自我的伦理学”。以往他力图揭示主体是如何在主流话语实践中被构成和塑造的,以及其中的权力机制,可以说他更多地注重反思和批判社会规范的控制系统。到了80年代,他把注意力转向阐述“自我的伦理学”,即个体是如何通过一套伦理学和自我塑造的技术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同一性。对于福柯来说,仅仅揭示个体被他者(如社会规范)通过话语实践构成为主体是不够的,还要关注个体的